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比較及公眾史學研究中心

在職老師培訓課程

二十世紀亞洲的現代化與蛻變

二十世紀香港的成長與發展

一、殖民地、殖民主義 (科大衛教授主講)

二、國際城市與身份認同

A 總論

- 城市與鄉村
- 「本土聯繫」與「國際潮流」
- 建構與解構

B 上海經驗

- 從葛元煦《滬游雜記》到穆時英《上海的狐步舞》
- 李歐梵，《上海摩登》

C 哈爾濱經驗

- James H Carter 對於 1910 年代至 1930 年代哈爾濱的研究

D 台北經驗(刪)

- 荆子馨有關日據時代台灣「皇民化運動」的研究
- 王甫昌，《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

E 廣州經驗

- 程美寶有關「廣東文化」的研究

F 香港經驗(歸併入 E)

- 陳鏗勳，《香港雜記》
- 呂大樂有關香港文化的研究

歐洲歷史上的城市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註 1]

- 城鄉之間的對立是隨著野蠻向文明的過渡、部落制度向國家的過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過渡而開始的，它貫穿著文明的全部歷史直至現在。 [頁 56]
- 城市和鄉村的分離還可以看出是資本和地產 [即土地] 的分離，看作是資本不依賴於地產而存在和發展的開始，也就是僅僅以勞動和交換為基礎的所有制的開始。 [頁 56]
- 獲得自由的農奴，……不斷流入城市的逃亡農奴，……各行各業的手藝人聯合為行會 [頁 57]
- 分工的進一步擴大是生產和交往的分離，是商人這一特殊階級的形成。……這樣就產生了同鄰近地區以外的地區建立貿易聯繫的可能性。……城市彼此建立了聯繫，新的勞動工具從一個城市運往另一個城市，生產和交往間的分工隨即引起了各城市間在生產上的新的分工，不久每一個城市都設立一個佔優勢的工業部門。最初的地域局限性開始逐漸消失。 [頁 59]
- 在中世紀，每一城市中的市民，為了保護自己的生活，都不得不團結起來反對農村貴族；商業的擴大和交通道路的開闢，使一些城市知道了另一些同樣利益、反對同樣敵人的城市。從各個城市的許多地方性居民團體中，逐漸地、非常緩慢地產生出市民階級。 [頁 59-60]
- 不同城市之間的分工的直接結果就是工場手工業的產生，即超出行會制度範圍的生產部門的產生。……工場手工業還成了農民擺脫那些不雇用他們或付給他們極低報酬的行會的避難所，就像在過去行會城市是農民擺脫土地佔有者的避難所一樣。 [頁 61-62]
- 隨著工場手工業的出現，工人和雇主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在行會中，幫工和師傅之間存在著一種宗法關係，而在工場手工業中，這種關係由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金錢關係代替了；在鄉村和小城市中，這種關係仍然帶有宗法的色彩，而在大城市、真正工場手工業城市裏，這種色彩在最初階段就幾乎完全消失了。 [頁 63]
- 美洲和東印度航路的發現擴大了交往，從而使工場手工業和整個生產的發展有了巨大的高漲。……商業和工場手工業的擴大，加速了活動資本的積累。……美洲的金銀在歐洲

市場上的出現，工業的逐步發展，貿易的迅速高漲以及由此引起的不受行會束縛的資產階級的繁榮和貨幣的廣泛流通。 [頁 63-64]

- 這一時期還有這樣一些特徵：禁止金銀外運法令的廢除了，**貨幣貿易**、**國債**和**紙幣**產生了，**股票投機**、**有價證券投機**和各方面的投機倒把等現象出現了。……[頁 66]
- 在十七世紀，商業和工場手工業不可阻擋地集中於一個國家—**英國**。這種集中逐漸地給這個國家創造了相對的世界市場，因而也造成了對這個國家的工廠手工業產品的需求，這種需求是舊的工業生產力所不能滿足的。……這種超過了生產力的需求正是引起中世紀以來私有制發展的第三個時期的動力，它產生了**大工業** - 把自然力用於工業目的，採用機器生產以及實行最廣泛的分工。 [頁 66]
- 大工業通過普遍的競爭迫使所有人的全部精力極度緊張起來。**只要可能，它就消滅意識形態、宗教、道德等等，而當它不能做到這一點時，它就把它們變成赤裸裸的謊言。它首次開創了世界歷史，……它把自然形成的關係一概消滅掉……；它把這些關係變成金錢的關係。它建立了現代的大工業城市(它們像閃電般迅速地成長起來)來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凡是它所滲入的地方，它就破壞了手工業和工業的一切舊階段。它使城市最終戰勝了鄉村。……[頁 67]**

Fernand Braudel, trans. Sian Reynolds,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Vol. 1, The Structure of Everyday Life: [註 2]

- A town is always a town. ...I do not mean that all towns are alike. But over and above their distinctive and original features, they all necessarily speak the same basic language: common to them all are the continuous dialogue with their rural surroundings, a prime necessity of everyday life; the supply of manpower, ...; **their self-consciousness - their desire to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others**; their inevitable locations at the centre of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large and small;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suburbs and with other cities. [p. 481]
- Every town is and wants to be a world apart. [p.491]
- Its (Europe's) towns were marked by an unparalleled freedom. [p. 509-510]

- They (the towns) invented public loans, ...they reinvented gold money. They organized industry and the **guilds**; they invented **long-distance trade, bills of exchange**, the first forms of **trading companies and accountancy**. They also quickly became the scene of **class struggles**. ...nobles against bourgeois; poor against rich. ...This society divided from within also faced enemies from without – the worlds of the noble, prince or peasant, of everybody who was not a citizen. [p. 512]
- **Capitalism and towns were basically the same thing in the West.** [p. 514]
- Simplifying, one could say that the West has had **three basic types of town** in the course of its evolution: open towns, that is to say not differentiated from their hinterland, even blending into it (A); towns closed in on themselves in every sense, their walls marking the boundaries of an individual way of life more than a territory (B); finally towns held in subjection, by which is meant the whole range of known controls by prince or state (C). [p. 515]
- Within it (the *ancien regime*), the cities were an example of deep-seated disequilibrium, asymmetrical growth, and irrational and unproductive investment on a nation-wide scale. [p. 556]
- What was happening at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as a progressive urbanization. ...The world of the *ancien regime*, very largely a rural one, was slowly but surely collapsing and being wiped out. ...Not London, but Manchester, Birmingham, Leeds, Glasgow and countless small mill-towns launched the new age. [p. 557]

中國歷史上的城市

- 與歐洲城市比較，中國城市在人口、面積、商業繁華等各方面毫不遜色。
- 中國城市內也存在各色各樣的會館、行會、坊鋪、神廟等地域、行業、宗教組織，組織也能夠發揮相當大的作用，管理日常事務。
- 但中國城市從來沒有演變成獨立的政治力量；也沒有產生出自己的身份認同。文化精英雖然骨子裡喜愛城市，在辭令上總要譴責城市的腐敗、墮落。直至清末民初，才產生根

本的改變。

上海經驗：從葛元煦《滬游雜記》到穆時英《上海的狐步舞》

《滬游雜記》袁序：「……迨道光季年，五口通商，中外互市，遂成巨觀。近則輪舶愈多，外海長江，四通八達。人物之至止者，中國則十有八省，外洋則廿有四國。猗歟盛哉！自生民以來未有若是之美備者也！向稱天下繁華有四大鎮，曰朱仙、曰佛山、曰漢口、曰景德。自香港興而四鎮遜焉，自上海興而香港又遜焉。予履茲土廿有餘載，目見耳聞，日新月盛。思仿《日下舊聞》、《都門紀略》體例，編輯成書，俾士商之來游者有所稽攷，不致心迷目眩，苦於塵勞。鮮暇，未獲如願。吾友同里葛君理齋，寓滬有年，時相過從。茶餘飯罷，歸，輒編記若干則。日復一日，積久成帙，分爲四卷，頗便繙閱。美矣！備矣！蔑以加矣！光緒二年（1876）丙子冬十一月，錢塘袁祖志序翔甫識。」

- 葛元煦序：
- 余遊上海十五年矣，寓廬屬在洋場，耳目所及，見聞遂夥。因思此邦自互市以來，繁華景象，日盛一日。停車者踵踵相接，入市者目幾眩，駸駸乎駕粵東、漢口諸名鎮而上之。來游之人，中朝則十有八省，外洋則二十有四國。各懷入國問俗、入境問禁之心，而語言或有不通、嗜好或有各異。往往悶損，以目迷足裹爲憾。旅居無事，爰仿《都門紀略》，輯成一書，不憚煩瑣，詳細備陳，俾四方文人學士、遠商巨賈，身歷是邦，手一編而翻閱之，……光緒二年（1876）冬至日，仁和葛元煦識。
- 周星詒，《窳橫日記》[註 4]
- （光緒十年[1884]六月十三日）海上人多喜乘馬車。挈妓游靜安寺。……其地祇一申園，中惟一樓及兩軒，卉木極少，既無竹、樹、池、石、長廊、曲室爲之點綴，鮮可悅心。游者交申、酉後，買馬車奔馳而至，坐廊下飲茶一壺，看男女雜眾出入往來，拍肩交臂，上下登走。座不及暖，天將薄暮，于是紛紛登車，輾輾輪響，頃刻間如鳥獸散。游者亦復從眾驟馳而歸。試問此游有何可樂、而好之者必有人，殊無謂矣！

- 予謂涼夜月好，十三以後，十八以先，于舖飯後，約佳士二三，各攜解事雙鬟，挈笙笛鼓板，乘月而往，于廊下隨意列坐，烹佳茗一甌，諸姬則修篴調笙，歌崑山曲一兩闕，與諸友啜茗，當風聽之。彼時風景，定當不惡。……
- 顧予從者張升，好步行浦灘，歷諸馬頭，看輪船行止，津津道說，意謂樂無過此者，日必一行，不為厭倦。其無謂又百倍于靜安寺矣!
- 葛元煦，《滬游雜記·馬車》：西人馬車，有雙輪、四輪者，有一馬、兩馬者，其式隨意構造，宜雨宜晴，各盡其妙。近來華人設稅車廠，馳驅半日，價約洋銀兩餅，賈客倡家，往往稅坐游行。近則黃浦繞馬路，遠則至徐家匯、靜安寺。然不及西人車堅馬馴，往往失事。[註 5]
- 葛元煦，《滬游雜記·馬路》：租界大街，由東至西者，統稱馬路。……經工部局陸續整理，兩旁砌以石礮，較馬路稍高，礮下砌石條微側，引水入溝，雨過即可行走。專司馬路工程者，為馬路管、又稱街道廳。其法：先將舊泥鋤鬆，滿鋪碎石或瓦礫七、八寸，使小工以鐵錘擊碎，再加細沙一層，用千觔鐵播，合數十人牽挽，從沙面滾過，其平如砥。遇小缺陷，隨時修補。英界南之陳家木橋……老閘等處，為擔水要道，改用碎石大小疊砌，以石灰、膠泥拌摻縫內，水不存積，歷久不壞，且每日掃除兩次，尤為潔淨。[註 6]

陳鏞勳，《香港雜記》(1894)[註 11]

- **國家政治**：……羅制軍之在港，實心實力，為國為民。設庠序，則建中環大書館，延史安為先生；惠閭閻，則創街市於民間，命幫辦為市正。他如驛務之設，其始本為傳遞祖家文件，至是特設衙門，並代商賈通傳信息，利權為之一開。[頁 40]
- **中西醫所**：……國家痼瘵在抱，所以養民之生、恤民之死者，洵無微之不到矣。[頁 67]
- **民籍練兵**：……以荒僻小島，五十年間林林總總至二十餘萬人，成一富庶之區，誠出人意計外者。雖曰人事，豈非天意! [頁 70]
- **水道暗渠**：……水道之工程繁浩，英官於此苦心經營，非親歷其景者不知。……衢道既一律更新，香港可稱為東道之淨土，不減於英京。[頁 84-85]

頹加蕩(decadent): 邵洵美,《花一般的罪惡》(1928):

那樹帳內草褥上的甘露，正像新婚夜處女的蜜淚；
又如淫婦上下體的沸汗，能使多少靈魂日夜迷醉。

意識流: 穆時英,《上海的狐步舞》(1932)

上海。造在地獄上面的天堂!.....

蔚藍的黃昏籠罩著全場，一隻 saxophone 正伸長了脖子，張著大嘴，嗚嗚地沖著他們嚷。當中那片光滑的地板上，飄動的裙子，飄動的袍角，精緻的鞋跟，鞋跟，鞋跟，鞋跟，鞋跟。蓬鬆的頭髮和男子的臉。男子的襯衫的白領和女子的笑臉。伸著的胳膊，翡翠墜子拖到肩上。整齊的圓桌子的隊伍，椅子卻是零亂的。暗角上站著白衣侍者。酒味，香水味，英腿蛋的氣味，煙味.....獨身者坐在角隅裏拿黑咖啡刺激著自家兒的神經。

舞著：華爾滋的旋律繞著他們的腿，他們的腳站在華爾滋旋律上飄飄地，飄飄地。

兒子湊在母親的耳朵旁說：「有許多話是一定要跳著華爾滋才能說的，你是頂好的華爾滋的舞侶—可是，蓉珠，我愛你呢！」 [註 7]

李歐梵,《上海摩登》: 一種中國世界主義 [註 8]

- 由此我認為，盡管本書所討論的上海作家帶著喧嘩的西化色彩，但他們從不會把自己想像為，或被認為是因太「洋化」了而成了洋奴。.....雖然上海有西方殖民存在，但他們作為中國人的身份意識卻從不曾出過問題。[頁 326]
- 要是列文森讀了顯尼支勒 (Arthur Schnitzler) 在中國的更多的譯本，他一定會發現這個維也納作家的絕大部份重要作品都被翻譯了或是在施鵬存編的雜誌《現代》上做了譯介。.....顯尼支勒的戲劇絕大多數是由趙伯言翻譯的。為什麼這麼一小群中國知識分子在那樣匱乏的一個時代，卻成功地譯介了這麼豐富的西方文學作品？一個方便的答案是，當時的城市閱讀群體顯然對此有需求，不管這個群體相對於整個中國的人口而言是多麼微不足道。.....如果說世界主義就意味著「向外看」得永久好奇心 - 把自己定位為

聯結中國和世界的其他地方的文化斡旋者 -- 那上海無疑是 30 年代最確鑿的一個世界主義城市，西方旅遊者給她的一個流行稱謂是「東方巴黎」。撇開這個名稱的「東方主義」含義，所謂的「東方巴黎」還是證實了上海的國際意義，而且這個名稱是按西方的流行想像把上海和歐美的其他都會聯繫起來的。而實際上，在亞洲，上海已經替代東京（毀於 1923 年的地震）成了都會樞紐網的中心，.....[頁 328]

- 香港作為上海的「她者」：.....從張愛玲的散文與小說看來，她的感受相當複雜，好像她在時的香港（大約 1940 年）是寡廉鮮恥的殖民化，而同時期的上海卻不是這樣，至少不完全是，因為香港沒有上海的「涵養」- 這個詞最初是用來指一種受過教育的世故，它使人能夠自我克制並保持溫文爾雅的外表。.....香港在摹仿西方時，終究是太喧嘩太粗俗太誇張了，造就的也就止於文化上的嘩眾取寵品，因此張愛玲會把香港描寫成一個急於去魅惑她的殖民主子的「妓女」，而這個城市顯然是很有目的地把自己置身於西方殖民者的注視之下，並僅僅按殖民者的想像來物化自己。 [頁 339-340]
- 然而，在經濟的瘋狂增長之中，我們也應看到一個奇怪的文化景觀：當香港把上海遠遠拋在後面時，這個新的大都會並沒有忘記老的；事實上，你能發覺香港對老上海懷著越來越強烈的鄉愁，並在很大程度上由大眾傳媒使之鞏固（使之不被遺忘）。 [頁 344]

哈爾濱經驗：創造一個中國的哈爾濱! - James H Carter 的研究 [註 9]

- 哈爾濱因俄國興建**中東鐵路**而出現於 1898 年。最初是個徹頭徹尾的俄羅斯城市，1900-1910 年間，不少游覽哈爾濱的歐洲人，都視哈爾濱為「滿洲巴黎」。 [頁 11]
- 道裡、南崗、香坊是租界區，而道外、傅家甸是中國人社區。這種二元城市格局，與上海相似。 [頁 21-22]
- **鄧潔民**畢業於天津的南開學校，於 1914 年夏游學日本，在早稻田大學的 YMCA 宿舍結識李大釗。1917 年秋回國，1918 年 4 月 1 日在哈爾濱創辦有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東華學校**，隨即把 5 月 7 日列為國恥紀念日，蓋指三年前（1915）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款。 [頁 31-64]

- 1919年夏，張作霖勢力日益穩固，1920年夏，以北洋政府名義，佔領哈爾濱的俄國領事館和法庭，並於1920年10月31日成立東省特別行政區，取代以中東鐵路當局為核心的哈爾濱俄國勢力。另一方面，日本亦積極加強其在東三省的影響，而英、法、美三國則插手干預，希望遏制日本的擴張，提出將中東鐵路由國際共管，此舉固然使日本非常惱怒，但也刺激了哈爾濱地區的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 [頁 94-95]
- 隨著俄國在哈爾濱的治外法權喪失，哈爾濱開始由中國警察和法庭管理，外國傳媒經常誇大其辭地報道中國當局迫害俄國人新聞。 [頁 107-115]
- 1926年9月15日**籃球比賽事件**，東華學校籃球隊與YMCA籃球隊（以白俄難民組成）比賽，東華隊落敗，引發騷亂。YMCA的美籍主任緊急電召美國領事求救，美國領事要求中國警察到場維持秩序。中方與外國傳媒就此事的真相，各執一詞，雖然最後兩校互相道歉了事，但反映出哈爾濱中國人之民族主義情緒之強烈。 [頁 118-124]
- 哈爾濱的中國民族主義運動，還表現在建築上，朱慶瀾於1923年就任東省特別區首任行政長官後，積極推動極樂寺建築計劃，**極樂寺**於1924年9月28日開幕，成為哈爾濱首座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建築。 [頁 136-141]
- **哈爾濱市第三中學**也在1923年開始興建，也是採用中國式建築。該中學北面就是中東鐵路，意在彰顯中國特色。 [頁 141-144]
- 1925年末，張煥相繼朱慶瀾就任東省特別區第二任行政長官，與朱慶瀾一樣，也大力推動中國化，1928年，**孔廟**開幕。 [頁 147-153]
- 1928年11月9日「**一一九事件**」：哈爾濱學生組織哈爾濱學生維持路權聯合會，反對日本在滿洲、蒙古擴建五條鐵路，並於11月5日起發動示威，張煥相向示威學生發出曖昧的訊息：一方面表示對於學生的愛國情緒「大受感動」，另一方面勒令他們不得在道外區示威（道外區為張煥相政敵、濱江道尹蔡允升所管轄）。但示威群眾於11月9日衝入道外區，與幾百名警察衝突，受傷群眾人數，一說約四十，一說約二百四十。 [頁 171-179]
- Nationalism has been the futile attempt to draw impermeable and permanent boundaries onto landscapes that defy the effort. Just as the PRC authorities were unable to control the discourse about Harbin's past, the nationalists of the 1920s were unable to control the nationality of their city even during their lifetimes. But in studying these attempts, we learn much about **how**

people seek to define themselves and their world. [p. 195]

廣州經驗：「研究鄉邦文化 發揚民族精神」 -- 程美寶有關「廣東文化」的研究 [註 10]

- 從 1940 年 2 月 22 日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舉辦的「廣東文物展覽會」，以概括清末以來的「廣東文化」內容：
- (1) 廣東思想文化既開風氣之先，又秉承中國學術之正統。惠能、張九齡、陳百沙、湛若水、陳澧、朱次琦、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
- (2) 廣東族群劃分以中原漢人血統認同為依歸：粵、客、潮三大方言族群，無不擁有正宗的漢族血統和文化淵源。
- (3) 嶺南地區婚姻、喪葬、節令、飲食等民俗，以及方言文學如木魚書、南音、粵曲、咸水歌等。 [頁 41-42]
- 歷代廣東學者都極力證明廣東的文化正統性，如明末清初的**屈大均**宣稱「今粵人大抵皆中國種」(頁 47)、清朝**陳澧**《廣州音說》認為粵音合於「隋唐時中原之音」、晚清客家籍文人**溫仲和**編《嘉應州志》也強調「吾州方言，多隋唐以前之古音」 [頁 75]
- 1824 年，在兩廣總督阮元的支持下，**學海堂**成立於廣州。1923 年，**賴際熙**於香港開辦學海書樓，遺老如**陳伯陶**、**朱汝珍**、**岑光樾**、**溫肅**、**區大典**、**區大原**等任教。 [頁 170、206]
- 「客家自成爲一獨立於粵、潮之外的族群，就是時移世易，種族觀念被引進中國的結果。20 世紀以前，廣府人與潮州人關心的只是他們是否『與中州同』，而不是強調自己與別的方言群的民族身份的區別；可是，客家人因爲被視爲非漢族，便極力論證自己的『民系』身份，考辨的結論當然是，客家人才是最純種的漢人。本來漢人的身份認同是沒有種族因素的，但客家人創造他們的漢人身份的時代，正好是革命黨人把種族問題突現得最尖銳的時代，結果客家人的身份認同的形成倒是帶出了『民系』或現在稱爲『族群』的意義出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制造』著他們理想的國家 -- 既創造了觀念，也創造了實體。」 [頁 95-96]
- 晚清的排滿運動中，粵語也成爲革命工具之一，梁啟超曾經親自操刀，撰寫《班定遠平西域》的粵劇劇本，並攙雜英語、日語：「(匈奴使者) 我個種名叫做 Turkey，我個國名

叫做 Hungary，天上玉皇系我 Family，地下國王都系我嘅 Baby。今日來到呢個 Country，堂堂欽差實在 Proudly。可笑老班 Crazy，想在老虎頭上 To play。叫我聽來好生 Angry。呸！難道我怕你 Chinese？難道我怕你 Chinese？（隨員唱雜句）オレ系匈奴嘅副使，除了アノ就到我エライ。哈哈好笑シナ也鬧是講出へ（イ）タイ，叫老班箇[口既]ヤ(ツ)ツ來ウルサイ。佢都唔聞得オレ嘅聲名咁タ（ツ）カイ，真系オ | バカ咯オマへ。」 [頁 160-161]

- 1922 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下令各小學統一使用以標準白話編寫的教科書，……粵語文學還是停留在聲息娛樂的層面，沒有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頁 162]
- 1936 年夏，設於南京中央電影檢查委員會宣佈，爲了進一步推廣國語，各地從今不得制作方言電影，兩廣地區亦禁止上映粵語電影。 [頁 238]
- 他們（接受了西學的中國知識分子）在西方找不著中國，他們也不願意在舊中國裡找回中國，爲了建構一種新的國家意識，他們到群眾中去。 [頁 212]
- 民國知識分子對「地方文化」和「民眾文化」產生興趣，背後是有一個民族主義的議程的。他們要創立的，是一個「民族的」新文化，「地方」本身並不是他們的終極關懷。 [頁 239-240]
- 在民粹主義背後，民國知識分子的終極關懷，仍然是民族主義。這套以統一的中華民族爲前提的民族主義，不但主導了他們的思想，還深深地影響著他們的詞匯和語法。 [頁 240-241]

註釋

[註 1]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B. 意識形態的現實基礎〉，〈1. 交往與生產力〉，載中共中央馬克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恩格斯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一卷，頁 56-68。

[註 2] Fernand Braudel, trans. Sian Reynolds,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Vol. 1, The Structure of Everyday Lif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5), Chapter 8, “Towns and Cities”, pp. 479-558.

- [註 3] 葛元煦，《滬游雜記》，光緒二年(1876)刊，日本藤堂良駿訓點，易名《上海繁昌記》，明治戊寅(1878)刊，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四十二輯 411(台北：文海出版社，1988)。按，據該日本刊印本一六居士序，藤堂良駿號三栗居士，「嘗□判神奈川縣，海外貿易事務，□其所熟悉云」，見頁 14。
- [註 4] 周星詒著，《瘋橫日記》，載王大隆輯，《乙亥叢編四種》，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第 305-306 冊，總頁 6-7。
- [註 5] 葛元煦，《上海繁昌記》，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四十二輯 411，頁 93。
- [註 6] 葛元煦，《上海繁昌記》，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四十二輯 411，頁 41-42。
- [註 7] 李書敏、嚴平、蔡旭編，《陸蠡穆時英散文小說選》(重慶：重慶出版社，1999)，頁 369-380。
- [註 8] 李歐梵著，毛尖譯，《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 1930-1945》(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 321-353。
- [註 9] James H. Carter, *Creating a Chinese Harbin: Nationalism in an International City, 1916-1932*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 [註 10] 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清末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北京：三聯書店，2006)。
- [註 11] 陳鏗勳，《香港雜記》(香港：出版者不詳，1987，影印光緒 20 年[1894]香港中華仿聚珍版本)。按：此書亦有簡體標點本，見陳鏗勳撰，莫世祥校注，《香港雜記外二種》(嶺南叢書，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6)，本文所引用者為莫本。

三、推薦材料

- (1) 魯迅，〈略談香港〉，〈再談香港〉，載盧瑋鑾(小思)編，《香港的憂鬱：文人筆下的香港(1925-1941)》(香港：華風書局，1983)，頁 3-17。
- (2) 呂大樂，〈自成一體的香港社會〉，載吳俊雄、張志偉編，《閱讀香港普及文化, 1970-2000》(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頁 663-670。
- (3) 李歐梵著，毛尖譯，《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 1930-1945》(北京：北京大學出

版社，2001)，頁 321-353。

四、參考文獻

王甫昌，《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3。

朱耀偉，《他性機器？：後殖民香港文化論集》，香港：青文書屋，1998。

吳俊雄、馬傑偉、呂大樂編著，《香港·文化·研究》，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6。

香港嶺南學院翻譯系編譯，《解殖與民族主義》，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

陳鏗勳，《香港雜記》，香港：出版者不詳，1987，影印光緒 20 年（1894）香港中華仿聚珍版本。按：此書亦有簡體標點本，見陳鏗勳撰，莫世祥校注，《香港雜記外二種》，嶺南叢書，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6。

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清末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北京：三聯書店，2006。

葛元煦，《滬游雜記》，上海灘與上海人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按：此書亦有日本選刻本，見葛元煦，《上海繁昌記》，載《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 42 輯 411 號，台北縣永和市：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8。

盧瑋鑾（小思）編，《香港的憂鬱：文人筆下的香港（1925-1941）》，香港：華風書局，1983。

謝均才編，《我們的地方，我們的時間：香港社會新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New York: Verso, 1983, 2006. 按：此書有中譯本，見班納迪克·安德森著，吳叡人譯，

《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

Carter, James H., *Creating a Chinese Harbin: Nationalism in an International City, 1916-1932*.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Ching, Leo T.S., *Becoming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Form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按：此書有中譯本：荆子馨著，鄭力軒譯，《成

為「日本人」：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台北：麥田出版，2006。

Faure, David 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Societ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Faure, David, *Colonialism and the Hong Kong Mentality*.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3.

Lee, Leo Ou-fan (李歐梵),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按：此書有中譯本：見李歐梵著，毛尖譯，《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 1930-1945》，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